



中国史家
论苏联
四种

柳 植 著

世纪性的实践

SHIJIXING DE SHIJIAN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世纪性的实践

柳 植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性的实践/柳 植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1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ISBN 7-81052-757-6

I. 世... II. 柳... III. 苏联—现代史—研究
IV. 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692 号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世纪性的实践

柳 植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58
发行部 0551-5108397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王先斌
封面设计 张 犇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7.875
字 数 448 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757-6 / K·57

全套定价:148.00 元
本册定价:37.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序

长期以来,中国的苏联史研究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天下,从论点 to 史料差不多都取自这本“经典”。我国对苏联历史进行独立的、科学的研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事。坏事变好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认真反思和研究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和诸多问题。错误是我们自己犯的,但从源头考察却是同斯大林模式分不开的。这样,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了对苏联历史的艰难而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本丛书的作者郑异凡、徐天新、叶书宗和杨存堂(笔名柳植)四位教授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有大体相同的特点: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有比较扎实的基本功,能较为熟练地使用俄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有献身于这一学科、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正因为这样,在我国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在三中全会的鼓舞下,他们对苏联历史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在报刊上、学术会议上,就苏联历史上的各种问题,诸如列宁晚期思想、斯大林模式、十月革命、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农民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现代化、对外政策、卫国战争、大清洗及布哈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史人物评价诸问题提出不少颇有价值的新见解。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过程。一个问题的研究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的。这里既有思想解放的问题,也有能接触到的史料问题,甚至还有当时社会环境对提出的论点所能接受的程

度问题。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在起步阶段能看到的资料是非常有限的,而某些人的头脑还在“作茧自缚”,这直接影响到成果的发表。1984年,我曾借《世界历史》发表郑异凡的一篇文章之机写了一篇短评,叫作《没有必要作茧自缚》,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随时代的推移和实践的积累而发展。历史科学也不例外,要勇于并且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选择新的历史课题,对多年争论不休或者不敢问津的老问题提出新的答案。实践说明,在苏联史的研究上,人们的头脑一旦摆脱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束缚,就是根据不多的资料,也能得出新的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也许在开始的时候某些论证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显得单薄或者不够充分,也许某些论点会引起过学术界的争论,但是,随着资料的发掘,特别是苏联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随着对问题研究的深入,在许多问题上史学界逐渐取得了共识。当然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完全消除不同意见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我很高兴,在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80年代,有一批包括这四位学者在内的有志于苏联史研究的所内外学者就苏联史上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共同切磋,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在我国形成一个颇具实力的研究群体。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刻苦钻研,他们各自在研究课题上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专著。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是他们二十多年来发表的文章选编,^① 这些文章有不少曾经对我国理论界、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对恢复苏联历史本来面貌发挥过重要作用,推动了我国苏联史的研究。苏联解体以后,他们又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结合苏联和俄国的历史,总结一个大国解体、一个大党丧权的教训,评析苏联解体以后出现的事件和现象,苏联史的深厚功底使他们在这方面的文章也有其独到之处。

^① 郑异凡已经出版了从文化革命结束至苏联解体期间的文集《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所以郑异凡的《史海探索》只收苏联解体以后的文章。

文化需要积累。为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保存,为使后来的学者能看到他们的成果,保持史学研究的继承性,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本书的出版。这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举措。对历史的认识、对问题的探讨永无止境。这四位学者的文集所反映的是我国对苏联历史探讨研究的一个阶段的历程,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相信随着新档案资料的发表,随着认识的加深,在俄国和苏联历史的研究领域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史学作品问世。

朱庭光

2003年12月

前言

人生苦短,岁月如流,不知不觉中,自己将届“古稀之年”。从教五十年,一直同书本打交道,没有赫赫战功,也没有发明创造,只有一些研究历史的文章,选出一批自己认为还可以拿出来的编成一本文集,也算是对这平凡人生历程的总结和记录。

编入本文集的是 1978 年以来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东欧中亚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百年潮》、《俄罗斯研究》、《苏联历史问题》等各种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有关苏联历史研究的文章。其中有几篇经过改写,曾在作者 1989 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一书中用过,那本书早已买不到了。这次编入的是初发表时的原文,大部分文章是初次入集,有相当一部分是苏联解体以后写的。这些文章撰写的时间前后相隔 1/4 世纪,文章的视角、探讨问题的深度有比较大的差异和变化。把这些文章都原原本本地摆出,不仅可以使读者全面了解我的观点和看法,而且也可以从中了解我的思路、我的方法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现象之一。这一实践曾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新的世纪中,人们还会把这一历史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不断研究。用《世纪性的实践》作为书名,也表示我对这一实践的概括。

人是时代的产物,每个人的身上都刻有时代的烙印。我之所以走上研究苏联史的这条路子,与其说是出于我的志愿,还不如说是受时代的驱使。20 世纪 50 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都熟知“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这一口号。大学毕业后,组织上分配我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工作。后来跟胡锡年先生读了世界现代史的研究

生课程。至于把苏联史选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也是由客观现实提供的条件决定的。当时,在“一边倒”和“向苏联学习”的政治导向下,西方国家的文明被看作资产阶级的腐朽文明,而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出版物大多是宣传和介绍苏联的书籍和资料,有关其他国家的则很少,况且,我和当时的大多数大学生一样,学的外语是俄语。进行历史研究,一要有资料,二要有语言能力,既然苏联对我们的国家那么重要,就只有选择它了。

在学习和研究苏联历史的这条路上,几经风云变幻,我自己也经历了各种磨砺和锻炼。开始,我们把苏联完全作为光辉的榜样来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既是被指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的教材,也是学习苏联历史的经典。所以,最初我们所接受的苏联历史是一部正面宣传的典型,实际上只是斯大林的基本教条,根本谈不上是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了一系列所谓的“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新观点,而世界现代史、苏联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立即从中体会出新的精神,改变了那些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思想观点。可是不久,风向大变,赫鲁晓夫被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对斯大林的批评成为对党、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攻击,在苏联进行的一些改革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在“以苏为戒”、“反修防修”的思路指导下,在中国开展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从事苏联史研究的人只能赶快划清界限,并且投身于大批判的运动中。不仅如此,以前本来是按照报刊材料写的文章和教材也成了批判和检查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我对这一选择动摇了:一方面,觉得这门学科同政治关系太紧密,风险太大,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眼看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同学不断出成绩,相比之下显得自己无能,业务上不去。一度,我便转而研究中国史,而且还发表了几篇论文。

一切历史事变都可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应。被称为“十年

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确实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道德造成巨大的灾难。但是，“文化大革命”也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中国终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作为个人，我在那场革命中深受折磨，然而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促使我重新思考苏联的历史，重新把我拉回到研究苏联史的道路。自己终究还是读了不少关于苏联的书，对于苏联的历史有一定的积累。我越来越感到，我们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当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正确接受和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大家都熟悉毛泽东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最初实际上是从苏联学来的。现在，我们要改弦更张，走自己的路子，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正是出于要为国家的改革事业提供借鉴的动机，在1978年，我便写了《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一文，1979年又写了《赫鲁晓夫主义及其社会历史根源》。前一篇论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理论，后一篇则主张正确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这两篇文章一开头，便不好回头了。对文章中的观点有赞成的，也有批判的，迫使我继续研究，继续前进。同时，整个80年代是国内苏联问题和苏联历史研究的高潮，苏联东欧学会、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并且差不多每年都要召开不同专题的学术讨论会，我的不少文章都是为这些讨论会准备的。参加讨论会的机会多了，认识和熟悉的同行朋友也多了，大家互相启发，互相激励，研究的风气大开。为了推动国内苏联史的研究，我又创办和主编了《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和几位年轻人在教学工作之外约稿、写稿、看稿，跑印刷。日子过得很紧张，而研究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思路开阔了很多。

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围绕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主题。有些虽不属这个主题，如《历史的选择性》，但也是为了解决这一主题而写的。之所以围绕这一主题写了这样一些题目的文

章,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是由苏联历史的特点、同时也是我头脑中的主要疑问决定的。大家知道,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比较起来,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并不发达、小生产的农民仍占优势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首先会在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列宁、斯大林是怎样在俄国实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原理的?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那么曲折、坎坷,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对这些问题当然不容易作出简单的回答,必须对苏联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就这样,我就从十月革命、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研究下去。其次,也取决于当时的资料条件。尽管有关苏联历史的资料比其他国家多,但是,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仍感到十分缺乏,尤其是缺乏作为研究所必需的原始资料。我工作的地点地处北京、上海之外的西安,这方面的资料就更少了。我知道不少人经常靠上北京查材料来完成自己的科研题目。做什么事都要从实际出发。《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未出全的赫鲁晓夫及其他人的言论集、苏共党历次大会的决议集我们有,而且连俄文第5版《列宁全集》也有,也有解放后订阅的不少苏联报刊杂志,同时,我还从图书馆找到了全套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开始,我一直在嘀咕,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的经典,能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经过反复思考,这一疑虑打消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本身是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实践的。党的领导人的思想理论是确定党的路线、政策的主要依据,也是实践活动的总结和概括。对于党在每个时期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各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党内有些什么争论,以后又是怎样解决的,往往讲得很详细、很具体。他们的著作不仅可以作为研究资料,而且应该作为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依据(我不是说仅仅依靠这些著作)。当然,同政治家、理论家为了论证某一观点而从中摘章引句的办法完全不同,要对这些著作进行系统研究,弄清所有思想理论的产生的时

代背景和理论依据,揭示整个思想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并根据实践给以客观的评论。

除了资料,在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上的困惑和困难。自己思想上存在着许多陈旧的条条框框,史学理论落后。例如,过去一直认为:历史存在着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历史规律性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世界人民的康庄大道”;斯大林进行的国有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不断加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等等。但我在深入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时却发现,这次革命实际上是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时期而且本身具有独特特点的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经周折,历尽艰难。一代领导人同另一代领导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路线和政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路线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为了解答遇到的许多问题,我不得不去学习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不得不认真思考:什么是历史?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是历史的规律性?怎样理解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统对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等等。《论历史的选择性》和《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如果说在苏联解体以前我经常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发展过程及其原因的话,那么,在苏联解体以后我就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实践为什么这样短命?这个时候就不只需要思考苏联共产党各个时期路线、政策的成败得失,还要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去思考。要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放在俄国现代化的总进程中、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去思考。所以,后来所写的一些文章,例如:《1917年俄国革命原因与结果的相悖现象》、《农业集体化的理论与农民经济的历史命运》、《整个社会生活国家

化——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点》、《军事强国主义——斯大林建国思想的灵魂》、《20 世纪俄国历史曲折发展的启示》等,就是从比较广阔的视野去分析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

上面简略地介绍了我从事苏联史研究的曲折过程和这些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这些仅是我的一家之言,值得探讨的地方很多。这次编辑时压缩了部分过于冗长的文章,改了一些错字,其他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因为是论文集,这篇和那篇之间不免仍有重复之处。之所以没有删改,是由于不想改变每篇的结构。其实,即使是重复的地方也还有新的认识。

历史研究无止境。退休以后,接受了沈志华的邀请,参加了苏联历史档案的编辑整理工作,和几位朋友一起工作了几年,有了一大批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苏联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自己也要利用这些资料继续研究。

主编《苏联历史问题》十五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把一篇总结附录在后面。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东方史学会的慷慨资助,在这里深表谢意。

作 者

2002 年 11 月于西安书斋

目 录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序.....	朱庭光(1)
前言.....	(1)
理论思考	(1)
论历史的选择性	(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马克思主义 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	(20)
十月革命	(29)
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	(31)
1917 年俄国革命原因与结果的相悖现象	(53)
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77)
从争取美国道路到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79)
苏维埃民主与官僚主义	(111)
所谓《列宁遗嘱》的真谛	(145)
再论所谓《列宁遗嘱》的真谛	(176)
论列宁的最后思想	(195)
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与实质	(211)
从新经济政策到农业全盘集体化	(213)

“一国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	(236)
农业集体化的理论与农民经济的历史命运	(269)
整个社会生活国家化	
——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点	(294)
军事强国主义	
——斯大林建国思想的灵魂	(319)
军事思想上的脱离实际与片面性是苏德战争初期	
苏军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351)
赫鲁晓夫执政及其改革	(373)
赫鲁晓夫主义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375)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与苏联的体制	(402)
贝利亚事件真相	(413)
苏联“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431)
关于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三个纲领	(450)
一场惊心动魄的核对抗	
——美苏解密档案展示的古巴导弹危机	(467)
赫鲁晓夫、社会主义改革与历史研究	(489)
20 世纪俄国历史曲折发展的启示	(507)
附录廿五年的回顾	(517)
后 记	(1)
人名索引	(1)
СОДЕРЖАНИЕ	(1)

理论思考

论历史的选择性



作者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涅瓦河上

历史的发展有选择性。历史在选择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选择。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同氏族、部落、民族和国家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不断选择的过程。承认并研究历史的选择性,是为了正确地阐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作用,克服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为机械唯物论,把历史的规律性、必然性曲解为宿命论的偏向。应该把现代科学思想选择论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